



实体经济的通行划分

关于实体经济的定义，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认识并不统一，且不同时期大致通行的划分标准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传统观点认为，实体经济主要是从事有形物质资料生产的行业，服务业等非物质资料生产行业不在其中。例如，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实体经济包括第一、二产业；按照美国商务部的部门大类划分，金融、房地产、职业服务业、信息、教育医疗、餐饮娱乐及政府服务业等行业排除在外。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其在服务生产和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一些学者将相关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纳入实体经济。如金碚认为实体经济除了包括第一、第二产业，还应涵盖第三产业中的直接服务业和工业化服务业。美国在经历了泡沫经济带来的次贷危机之苦后，进一步拓宽了实体经济范围，将除了房地产和金融这两个泡沫程度较高的行业之外的所有事关民生疾苦、企业生存和市场稳定的行业都定义为实体经济。也有学者并不认同上述划分方法，如刘志彪提出“媒介观”，认为要看资本的增值活动以什么为媒介或中介，如果以货币、价值符号和资产为媒介就是虚拟经济，以使用价值商品和服务为交易媒介就是实体经济，以此来区分实体经济与“以钱生钱”为特征的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划分标准的变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生产力进步和与之相应的人们认识水平的提升。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导致需求升级，满足新需求的新产业发展壮大成为必然，从而使得过去有人认为是非实体经济的变成当下的实体经济。例如，在生产力水平勉强应付吃穿的农耕时代，农业当然是实体经济，而商业作为一种非实体经济受到打压和限制。在工业社会初期，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物质生产行业被视为实体经济，而服务业则被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到后工业时代，以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为主的现代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 and 民生改善的重要部分，自然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

然而总体上看，按照当下通行的思维模式，相当多数的人还是把实体经济认定为是有形物质产品产出的部门，在数据统计或政策制定等实际工作中往往以行业为对象来划分哪些行业是实体经济、哪些行业是非实体经济，哪些应支持、哪

社会福利标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定位

□ 金鵬輝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是一国经济实力的根本，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对于哪些属于实体经济，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等关键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新特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科学审视实体经济内涵，界定实体经济范围，从而切实做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落实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重大决策的前提。

些应限制。

现行实体经济划分带来的政策困惑

按照当下通行的划分，实体经济大致等同于有形的实业经济，并简单地将一个行业整体性判定属于实体经济或不属于实体经济。然而随着技术进步、网络发展、资本创造和管理创新，行业内部分工不断深化，产业链条上的某些环节会越来越专业化、规模化并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业态，行业内同一经济主体经营也呈多元化特征甚至跨越若干具有不同属性的行业，笼统基于行业的视角进行实体经济划分的科学性大大降低。同时，这种划分方法使一些新兴行业、多属性行业以及虚拟程度较高的行业，如互联网经济、房地产业以及金融业等与“实体经济”对立起来，而这些行业也承担着实体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要素供给、引擎驱动等作用，对我们制定行业政策带来了一些困惑。

金融内卷化促使金融业脱实向虚，但金融媒介化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活水之源。近年来，金融过度膨胀以至“脱实向虚”饱受诟病，金融活动中投机成分过多会加大市场波动，单纯的业内循环及“内卷化”衍生发展，使部分金融活动成为“以钱生钱”的工具，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初衷，甚至带来泡沫或系统性风险，这是造成金融业“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金融的产生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并非实体经济的对立面，而是参与价值创造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其一，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资金融通功能直接服务实体经济产出；其二，作为现代经济配置资源的核心，金融活动提供了流动性调剂、价格发现、风险管理的渠道，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的功能，其有效运作可以改善投融资效率，增加对社会各类群体的普惠服务，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笼统地把金融业排除在实体经济之外，不利于金融自身的发展，更无益于金融与经济的共生共荣。

房地产业的金融属性使其成为投机、炒作的集中地，但居住、保障、社会属性决定了其是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房地产行业的产业链条长，涉及的经济活动多，主要包括建造活动、交易活动、售后服务活动及房地产金融活动，且后三类活动的占比越来越高。房地产活动提供的产品及服务具有多重属性，既是生活必需品，也可以是奢侈品；既是居住用品，也可以是投资品；既是私人物品，也可以是公共品。所以房地产既有居住属性、社会属性，也有保障属性，还有金融属性。基于当前普遍存在的房地产行业投资过度、价格上涨过快等问题，很多人提出应将其视为非实体经济从而限制发展，实际上是忽略了房地产居住、保障和社会属性的积极作用。同样，如果将其全部视为实体经济并大力发展，则不利于平抑房价、稳定供给，保障刚性需求。现实中我们的政策往往在支持和限制之间摇摆不定。

互联网经济的虚拟特性使其在形式上与实体产业相去甚远，却又是新兴经济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由于互联网经济的产出很多看不见、摸不着，一般是通过消费间接影响实体产业，所以不少人认为其不属于实体经济。但是，“互联网+”作为新经济形态下先进生产力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优化共享经济下的生产生活环境、延伸生产服务范围、增加对弱势群体的服务等来提高效率和促进公平，改变传统行业的经营理念 and 经营模式，是传统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引擎，对传统经济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具有巨大促进作用。此外，“互联网+”的发展有助于实现经济集约化发展，对于缓解资源和环境约束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经济的形态虚拟与价值创造的两面性打破了实体经济认定的思维定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经济当然应是中央“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应有之义。

实体产业创造社会财富，但滞后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无效产出造成的是资源浪费和财富损失。相当多数人对实体经济的认识是能够创造产出、具有实体形态的生产与服务活动，但是，并不是所有存在实体形态或有产出的经济部门都能创造有效价值，有些甚至是在浪费资源、侵蚀或毁灭价值。例如，低效工业的经济活动是有产出的活动，但其对资源的占用与对经济的贡献严重失衡，浪费了资源，且成为产能过剩、杠杆高企的重灾区，特别是“僵尸企业”，不但无效占用大量土地、资金、原材料、劳动力等社会资源，造成生产要素配置扭曲，而且破坏市场优胜劣汰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若不加区别地加大金融支持，既与中央“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精神相悖，也无

益于经济质量与效益的提升。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应以增进社会总福利为标准

上述行业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使得现行实体经济的划分容易造成认知困惑，难以适用于新常态下实体经济的判断，也不利于做好金融支持工作。应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对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重新审视划分标准。发展实体经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根本的还是要增进社会总福利和优化社会福利分配，从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也只有这样，中央“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精神才能落到实处，相关金融支持政策才能真正发挥积极作用。

能否增进社会总福利，主要从效率和公平两个角度进行判断。效率是指通过提高投入产出比率，达到产出、效用及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目标。公平是指优化产品与服务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进而提高社会总效用水平，增进社会总福利。依据社会总福利标准，对于备受争议的金融、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可以按照具体经济活动的实质，进行如下划分：一是基于流动性禀赋和风险承担差异，金融体系需要一定程度的内卷化交易来扩展资金配置和风险缓释能力，进而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这些出于满足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需要的交易嵌套及业内循环活动有其必要性，与其他内生于经济的金融活动都应视为实体经济，而出于上述功能之外的内循环和内卷化金融活动则为非实体经济。二是发挥居住、

社会、保障属性的房地产经济活动都属于实体经济。例如，为了满足刚性人群的居住需求，或为了获得教育、医疗和便利的生活服务，或为了维护低收入群体居住权益的建造活动、交易活动及生产性服务活动等。而服务于投机、炒作等金融属性的房地产活动往往造成房源减少和房价上涨，挤占居住消费群体的选择空间并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因此不应归入实体经济。三是互联网经济本身尽管没有实体产出依托，只要能够提高要素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增进社会总福利，就属于实体经济，反之则不是。四是尽管大多数物质产出部门属于实体经济，但那些落后的、濒临淘汰的或产能过剩的经济部门及活动，不能实现个体劳动向社会有效劳动的有效转化，在社会福利效果上与虚高的泡沫经济无异，自然不在中央大力发展的范围内。

金融要发挥好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须基于上述判断进一步明确自身发展及政策支持定位，着重增强靶向效应。一是加快金融自身适度发展，提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应充分肯定大部分金融领域经济活动的实体经济属性，尊重金融体系自身的发展规律，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构建“阳光普照+锦上添花+雪中送炭”的金融谱系，提高金融服务水平、质量和覆盖面，做到货币政策松紧适度，金融杠杆水平适度，使金融资源“钱尽其用”，增强金融在提高社会总福利中的正外部性，同时，又要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严格把控金融“内卷化”的度，防止金融活动“脱实向虚”。二是按照社会福利标准对实体经济给予差别支持，实现金融支持的靶向定位。既应看到实体经济领域特别是制造业领域“僵尸企业”和落后产能活动损害社会福利的特征，通过信贷收缩和金融市场门槛提高逐步将其淘汰；又应看到服务业中诸如互联网经济等新兴业态活动的实体经济特征，通过鼓励创新引导其有序发展；还应看到房地产领域内大部分经济活动的实体经济特征，通过采取“重实抑虚”的结构性政策，促使其实体经济部分健康发展。



以供给侧经济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

□ 毛 强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必须确立的战略思路。

经济新常态的变与不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抓经济发展，首先要明大势、掌大势，顺势而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内在系统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正在重构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增长模式。”一是增长速度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二是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

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要实现我国经济发展良好转变，我们必须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而推动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战略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问题不解决，只刺激需求，经济拉不上去，即使短期拉上一点，也不可持续。尤其是重大的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如果只是简单采取扩大需求的办法，不仅不能解决结构性失衡，反而会加剧产能过剩、抬高杠杆率和企业成本，加剧这种失衡。

因为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扩大投资支出规模，而在于从供给侧创造有效的高质量的投资机会，使产业结构得以升级；不在于增长居民收入总量，而在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使社会消费倾向得以普遍提高。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

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通过去除没有需求的无效供给、创造适应新需求的有效供给，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打通供求渠道，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全面分析国内经济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我国市场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结构正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但由于有效供给不够、高端制造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质量提升、关键设备研发生产等相对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化，综合成本降低、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等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这要求我国必须围绕经济结构的制度性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来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通过优化现有供给结构来调整现有产品供给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深层次上解决供给同需求错位问题，满足现有产品和服务需求；通过优化现有产品和服务功能，大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和新业

态，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新的供给，以此来创造新的需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推进下，我国的供给体系必将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不断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最终形成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强大动力。

把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任务

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传统产业和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能尚未积聚。从国内看，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

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重点任务相互关联、环环相扣。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是为了调整供求关系、缓解工业品价格下行压力，也是为了企业去杠杆，既减少实体经济债务和利息负担，又在宏观上防范金融风险，为经济发展留出新空间。降成本、补短板，是为了提高企业竞争力、改善企业发展外部条件，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为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同时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我国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拥有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发展势头可以长期保持。同时，我国经济积累的矛盾和风险很多，必须爬坡过坎。我们必须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着力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着力优化现有供给结构，着力优化现有产品和服务功能，切实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